



新闻学国家特色专业系列教材

xin wen yu yan xue

新闻语言学

高小方 主编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561541



CS1712121

3

G210
0215

► 新闻学国家特色专业系列教材

xin wen yu yan xue

新闻语言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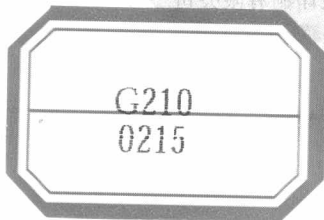
主编

高小方

副主编

毕春富 陈 羽 李晓华

邵天松 周必勇 李丽翀



重庆师大图书馆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32132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闻语言学 / 高小方主编. —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12

(新闻学国家特色专业系列教材)

ISBN 978-7-5651-1092-4

I. ①新… II. ①高… III. ①新闻语言—语言学—研究 IV. ①G21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8918号

书 名 新闻语言学
主 编 高小方
责任编辑 王 涛
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122号(邮编:210097)
电 话 (025)83598919(传真) 83598412(营销部) 83598297(邮购部)
网 址 <http://www.njnup.com>
电子信箱 nspzbb@163.com
照 排 南京理工大学印刷照排中心
印 刷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0
字 数 227千
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1-1092-4
定 价 32.00元

出 版 人 彭志斌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引 言

新闻语言即新闻作品的语言,是语言的一种职业变体,是新闻媒体中使用的面对一定受众的具有群体特征的语言,有着快速传输信息、影响大众的实践的品格。新闻语言学是新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将新闻信息传播、交际学与语言学相结合,认真借鉴写作学、文章学、文化学、心理学、传播学和信息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探讨全媒体条件下新闻语言的规律,研究新闻语言的语体特点、言语风格等相关内容。

这一分支学科尚未形成完整严密的科学系统;研究者主要还是新闻学领域内的一些专家、学者,语言学专家、学者少有涉足;国内高校都还未普遍开设这一学科,也未设置招生专业;相关论著不是很多,尚未形成规模。而新闻学的发展迫切需要语言学的参与,语言学的发展也需要谋求新的学术生长点。《新闻语言学》这一选题,恰恰可以把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连接起来。

时代向前发展了,新闻媒介也发生了并将继续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由纸质而声、光、电,由一报在手而一机在线,新闻语言的形式也随之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正如任彦申同志所指出的:

人们不难发现,当前在社会生活中已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语言符号体系,两种不同的舆论场。

一种就是网络语言,手机短信语言,群众生活语言,这类民间语言越来越追求简洁,追求生动有趣,追求新奇怪异,不断花样翻新地冒出一些新词汇、新概念、新符号。尽管它不规范、不科学,但却能很快流行,广为传播,尤其在青少年中大受欢迎。这些分散的、自发的民间媒体,虽然算不得主流媒体,但传播之快、覆盖之广、影响之大,常常令一些大媒体也自叹不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条短信息出来,几天之内能转发上亿次,传遍天南地北。有时,这些自发媒体会造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场,影响和左右着民众的舆论倾向和情绪指向。

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们的一些媒体宣传和官方语言,却缺少改进和创新,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东西过多,说教味、八股腔太浓,充斥着各种空话、大话、套话以及简单化、概念化、格式化、公文化的东西。本来一些先进的理念、睿智的思想、富有创新的政策和新鲜生动的实例,被这种套话和八股调一加工、一包装,都失去了应

有的光彩,变成了干干巴巴、令人乏味的东西。^①

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和其他行业的信息员与时俱进,勤于学习,尽快熟悉全媒体时代新闻语言的新特点。所以,研究全媒体时代的新闻语言学,写出教材或专著,开出新课,既是学科创新发展的需要,也是时代的召唤。

^① 任彦申. 后知后觉.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148—149.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古代典籍对新闻语言的启迪	1
第一节 《春秋》笔法与新闻舆论导向	1
第二节 《史记》、《汉书》的人物传记与人物通讯	6
第三节 《新序》、《说苑》与新闻故事	12
第四节 《盐铁论》、《白虎通》与会议纪要	19
第五节 《通鉴纪事本末》与事件报道	25
第六节 《春秋》与一句话新闻	28
第七节 《左传》与新闻叙事	33
第八节 《尚书》、《国语》、《战国策》与新闻记言	42
第二章 古语、外来语、方言与新闻语言	48
第一节 新闻作品中古语的运用	48
第二节 新闻作品中外来语的运用	60
第三节 新闻作品中方言的运用	66
第三章 传媒与新闻语言	75
第一节 报刊新闻语言的特点	75
第二节 广播新闻语言的特点	77
第三节 电影新闻语言的特点	81
第四节 电视新闻语言	83
第五节 网络新闻语言的特点	86

第四章 文体与新闻语言	90
第一节 消息	90
第二节 言论	93
第三节 通讯	99
第四节 特写	105
第五章 新闻语言的个人风格	107
第一节 黄远生的语言风格	107
第二节 王韬的语言风格	110
第三节 梁启超的语言风格	112
第四节 鲁迅的语言风格	118
第五节 邹韬奋的语言风格	125
第六节 毛泽东的语言风格	130
第七节 邓拓的语言风格	135
第八节 萧乾的语言风格	139
第九节 穆青的语言风格	143
参考文献	147
后 记	151

第一章 古代典籍对新闻语言的启迪

新闻,有两个意思:本指社会上最近发生的事情,比如你刚从老家来,有什么新闻给大家说说;又指报社、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报道的消息,比如新闻广播、采访新闻。

前者是最近发生的事情——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就逐渐成为历史;后者为媒体报道的消息——对现实的记载——随着时间的推移,就积淀成为史料。所以说,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是极为紧密的。据传是出自张良的老师——黄石公之手的《素书》说得好:

推古验今,所以不惑。

唐司空图《诗品二十四则·纤秣》云:

采采流水,蓬蓬远春。
窈窕深谷,时见美人。
碧桃满树,风日水滨。
柳阴路曲,流莺比邻。
乘之愈往,识之愈真。
如将不尽,与古为新。

南宋朱熹《鹅湖寺和陆子寿》诗云: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

学习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古为今用”说的就是:了解古人,是为了今人。

第一节 《春秋》笔法与新闻舆论导向

在咱们中国,设置专门的史官来写一种编年体(按年、月、日编排史实)的史书,这起源可

早了。据范文澜先生的意见,这种写史法从公元前 841 年(西周共和时期)就开始了。到东周时,一些文化较高的诸侯国都有史官记事。如:晋国的编年史名为《乘》(shèng),楚国的编年史名为《梲杙》(táo wù),鲁国的编年史名为《春秋》。^①

《春秋》本是鲁国史官写的编年史,记载了公元前 722 年至公元前 481 年共计 242 年间鲁国及其他诸侯国发生的大事。后经孔子(公元前 551—公元前 479 年)修订,成为“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之一。全文 18 000 字左右。

一、何谓《春秋》笔法

经学家认为《春秋》寓褒贬之意于字里行间,善善恶恶,后因称文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写法为《春秋》笔法(也叫《春秋》书法)。

例如:用“弑”字来贬斥杀死尊长的卑幼者——即卑幼者杀死尊长(多指臣子杀死君主或子女杀死父母),那就不叫“杀”,而叫“弑”(shì)。《春秋》中共使用了 25 个“弑”字,大多用来贬斥乱臣贼子。

《春秋·襄公二十五年》中“齐崔杼弑其君光”,用一“弑”字,就将乱臣崔杼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再比如《春秋·襄公三十一年》中“莒人弑其君密州”,虽然同样是“弑”,但主语却用了一个集合名词“莒人”,这就连同被弑的君主密州也遭了贬斥:若是个好君主,何至于触犯众怒?

但有时用“弑”字来贬斥的对象却并不是乱臣贼子,而是“良大夫”。原来这是在追究他作为领导者的责任。如:《春秋·宣公二年》中“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晋国的赵盾,担任正卿(相当于首相),是一位有责任心的“良大夫”。晋灵公恣意残害臣民,是个有名的暴君。赵盾面对暴君,敢于直谏,忠于国事。暴君要杀他,他只得逃亡。但他未及出境,就有人把暴君杀死了。因此,尽管他自己并未弑君,史官却仍把弑君之责记在了他的头上。对此,《左传·宣公二年》有详细记载:

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孰,杀之,寘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赵盾、士季见其手,问其故而患之。将谏,士季曰:“谏而不入,则莫之继也。会请先,不入,则子继之。”三进及溜,而後视之。曰:“吾知所过矣,将改之。”稽首而对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夫如是,则能补过者鲜矣。君能有终,则社稷之固也,岂惟群臣赖之?又曰:‘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能补过也。君能补过,衮不废矣。”

犹不改。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麇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秋九月,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趋登曰:“臣侍君宴,过

^① 范文澜. 中国通史(第一册). 人民出版社, 1978: 175—176.

三爵，非礼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杀之。盾曰：“弃人用犬，虽猛何为！”斗且出。提弥明死之。

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见灵辄饿，问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问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请以遗之。”使尽之，而为之箪食与肉，寘诸橐以与之。既而与为公介，倒戟以御公徒，而免之。问何故，对曰：“翳桑之饿人也。”问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

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

又如：用“王”字来倡导“大一统”理念——《春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

所谓“王正月”，就是指周天子所颁历法的正月。周以建子之月（农历十一月）为正月。对此，《公羊传》解释道：“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清赵翼《陔馀丛考·春不书王》：“《春秋》每岁必书‘春，王正月’……以周月记事者，则孔子书‘王正月’以别之，谓此正月乃王之正月，见其犹尊王也。”清代李汝珍（约1763—约1830年）的长篇小说《镜花缘》第五十二回亦云：“如《春秋》书月而曰‘王正月’。所以书‘王’者，明正朔之所出，即所以序君臣之义。”

《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唐代徐彦疏：“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汉书·王吉传》：“《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大，重视、尊重；一统，指天下诸侯皆统系于周天子。后世因称统治全国为大一统。如：郭沫若在《屈原》第二幕中有“老百姓都希望中国结束分裂的局面，形成大一统的山河。”

二、《春秋》笔法的实质

要把握《春秋》笔法的实质，有两则现成的话语可供我们参考。

一则是南宋俞文豹所言——“以正名为先”。

俞文豹在《吹剑录》中说：“朱文公《通鉴纲目》以正名为先……盖纯用《春秋》笔法也。”朱文公即南宋哲学家、教育家朱熹（1130—1200年），他撰写的《通鉴纲目》五十九卷，后经清代康熙皇帝“御批”，被收入《四库全书·史部史评类》。俞文豹认为朱熹撰《通鉴纲目》，也是像当年的孔夫子一样“以正名为先”，所以评价为“盖纯用《春秋》笔法也”。俞文豹之言，可谓一语道破，给我们今天理解《春秋》笔法的基本特点以很好的启迪。

什么叫“以正名为先”？就是把正确的立场、正确的提法包括正确的用字（遣词造句）摆在第一位。

另一则是我国现代小说家、散文家孙犁所言——“叫事实说话”。

孙犁在《澹定集·与友人论传记》中说：“它的传统作法是‘《春秋》笔法’，寓褒贬于行文用字之中，实际上是叫事实说话。”

古人表达其核心价值观往往不是靠空头议论，而是“叫事实说话”，所以贵实录。所谓“实录”，有两种意思：第一，名词义，即符合实际的记载。如：《汉书·司马迁传赞》中“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第二，动词义，即如实记载，真实地记录。如：唐朝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中“愚以为凡史氏褒贬大法，《春秋》已备之矣。后之作者，在据事迹实录，则善恶自见。”

顺便要说到，春秋时期坚持“实录”声誉最著者，除了上文提到的晋太史董狐外，还有齐太史、南史氏（也是春秋时齐国的史官）等。《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后因以“南史”为直书史实的良史典型。如：《后汉书·臧洪传》：“昔晏婴不降志于白刃，南史不曲笔以求存，故身传图象，名垂后世。”《南齐书·崔祖思传》：“世无董狐，书法必隐；时阙南史，直笔未闻。”清高其倬《蓟州新城》诗：“南史与董狐，百喙同一声。”程善之《和孟硕狱中诗》：“常山舌在心犹壮，南史书存手自持。”

综上所述，“以正名为先”，“叫事实说话”，应当就是“《春秋》笔法”的真正实质。那它与“新闻舆论导向”又有何联系呢？联系就在于：古圣贤留给我们的历史经验之一就是在坚持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追求事实的最大真实度。

三、新闻舆论导向的具体内涵

古今新闻报道皆贵实录。所谓“实录”，并不是指有闻必录，而是依据核心价值观，最大限度地传达事实之真实。这是新闻工作的原则。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坚守我们时代的核心价值观，才能把握正确的新闻舆论导向。其具体内涵，应该可以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的有关论述和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的精神中直接读到或领会到。邓小平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中说：

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在当前这个转变时期，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他们在思想教育方面的责任尤其重大。……作为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①

1996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①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 1993: 40.

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

根据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团结和动员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精神文明建设总的指导思想，也是精神文明建设总的要求。

江泽民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知识分子要加强学习，提高自己，努力成为先进思想的传播者、科学技术的开拓者、‘四有’公民的培育者和优秀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同广大工人、农民一起，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建功立业。”

2006年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委员时，提出以“八荣八耻”为具体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文汇报》2006年3月13日头版头条发表了评论员《在全社会树立正确的荣辱观》的社论：

这“八荣八耻”言简意赅、概括精辟，论述深刻、内涵丰富，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科学结合，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为我们新时期深入开展公民道德建设确立了新的价值标杆。

在全社会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是形成良好社会风气的文明基石。“不知荣辱乃不能成人。”人生在世，不知何以为荣、何以为耻，就会是非不分、善恶不明、美丑不辨，社会价值观的失衡，必将导致世风不正、人心败坏。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有目共睹，但一段时期来，实际生活中存在的种种不健康、不文明现象，造成了思想混乱和道德缺失，也影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引起群众不满。大力倡导以“八荣八耻”为具体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引导人民按照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来规范自己的道德行为，就会导人向善，醇化风尚，进而鼓舞人们积极向上，推动经济

社会健康发展。

树立正确的荣辱观,要旗帜鲜明地遵循社会主义的基本道德规范,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一点不可含糊。不能因为社会转型、价值多元就忽视思想道德建设,恰恰相反,越是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就越要坚守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呼唤社会主义的荣辱观,时刻以“八荣八耻”的荣辱观进德修业,我们才能塑造良好的公民品格、构建合乎理想的道德体系,为实现“十一五”又快又好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各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带头践行,是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关键。“八荣八耻”说的都是每一个人身边能做的事情,看得见、摸得着,可对照、可实践,有很强的操作性。把“八荣八耻”融入日常生活,成为全体公民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人人知荣而为之,个个知耻而不为,我们就一定能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队伍,把文明道德提升到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高度。

坚持正确的新闻舆论导向,其实质就是要坚守正确的价值导向,用事实说话,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践行“三个代表”、“八荣八耻”;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队伍;号召全社会同心同德,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建功立业。当然不是说“也要像《春秋》一样,用‘弑’、‘王’等有特定含义的字去写今天的新闻作品”,因为时代不同了,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涵也不同了。

第二节 《史记》、《汉书》的人物传记与人物通讯

《史记》是纪传体通史,《汉书》是纪传体断代史。所谓纪传体,就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叙述史实的一种史书体裁。这种体裁创始于司马迁:《史记》用“本纪”叙述帝王事迹,用“世家”记述王侯封国,用“表”排比大事,用“书”记载典章制度的原委,用“列传”记人物。《汉书》将《史记》的五体改成四体(书改为志,世家并入列传)。后历代所修正史——《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等,基本上都采用了这种体例。司马迁、班固人物传记的创作经验,对于今天新闻作品中人物通讯的写作,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史记》的人物传记

《史记》记事起于传说的黄帝,迄于汉武帝年间,首尾共三千年左右。全书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原名《太史公书》或《太

史公记》。作者司马迁，全书撰成于汉武帝太初元年至征和二年间（公元前104—公元前91年）。

《史记》历来为名家所重，西汉扬雄《法言·重黎》：“〔或问〕‘太史迁’。曰：‘实录。’”东汉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南宋洪迈的《容斋五笔》卷五《〈史记〉简妙处》中说《史记》的“文势”“如骏马下驻千丈坡”，“风行于上而水波，真天下之至文也”。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史记》“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说：“如果说，在前一阶段里，孔子、左丘明是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家，那么，在发展到较高的阶段上，太史公司马迁是更大的历史著作家。自从司马迁著《史记》，中国才开始出现了规模巨大的、组织相当完备的历史著作。”

《史记》对历史人物的叙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富于文学价值。所以，《史记》对两千年来的史学、文学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为后代“正史”树立了楷模，是叙事散文的典范作品。后世戏文所从取材者，就有《将相和》、《追韩信》、《鸿门宴》、《霸王别姬》、《马陵道》、《虎符》……可以断言，《史记》中人物传记的创作经验，还将继续对新闻写作尤其是人物通讯写作产生巨大的影响。

1. 《史记》剪裁材料的标准——“天下所以存亡”

《史记》开创了传记文学的范例，其剪裁材料的标准无疑给后人以宝贵的启示。司马迁在《留侯世家》里说：

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

张良是辅刘邦定天下的人物，不是关于兴亡成败的言行，都不足以表现这个人物，所以舍弃不用，可见《史记》剪裁材料的标准是“天下所以存亡”。站到这样的高度来处理材料，所以《史记》才能够极广泛而又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梁启超说得好：

后世诸史之列传，多藉史以传人；《史记》之列传，惟藉人以明史。故与社会无大关系之人，滥著者少。换一方面看，立传之人，并不限于政治方面，凡与社会各部分有关系之事业，皆有传为之代表。以行文而论，每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又极复杂之事项——例如《货殖列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所叙，皆能剖析条理，缜密而清晰，其才力固自夔绝。

总之，传与社会有大关系之人，叙与社会有大关系之事，不是为说故事而说故事，不是为写人而写人，而是要借此说明以往的得失，总结历史经验，这是《史记》剪裁材料的主要标准。我们认为，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传记文学包括人物通讯剪裁材料的主要标准，是使传记文学作品包括人物通讯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的必要条件。

2. 人物事迹正侧分叙——互见法

一个人物有关“天下所以存亡”的事迹，如果有好几个方面，那是不是“满天星”般地都放在本人传记中写呢？司马迁没有这样做。他总是想办法在本传中从正面集中表现出传主的主要特征和基本政治倾向。如：他写孔子，重在学礼、问礼、订礼、习礼；写屈原，重在“其志洁”；写李广，重在“才气无双”；写信陵君，重在“礼贤下士”。至于人物事迹的那些次要的方面，在本传中写反而有碍于主要特征的表现，便尽量安插在其他传记中写。如在《项羽本纪》中集中一切有关重要事件，着重从正面突出表现了项羽勇敢善战、所向无敌、叱咤风云的气概和性格，而把他政治上、军事上的错误则放在《淮阴侯列传》中写。这样处理是“两得”，反之，将是“两失”。

所以，《史记》这种人物事迹正侧分叙互见的方法，实在称得上是一种十分高明的手法，对于塑造种种个性各别、形象鲜明的人物，是极为有用的——容易凸显出“这一个”。

3. 瑕瑜互见——富有立体感、真实感

《史记》还有另一种互见法，这就是瑕瑜互见，既写足人物的长处，也不护短，用班固的话来说，就是“不虚美，不隐恶”。这是使传记文学具有真实感的一个重要基础，它无疑比那种“高、大、全”的写法，有着更强的感染力。如《李将军列传》，作者既写了李广的大智大勇，对他的不幸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又写了 he 杀死误犯虎威的霸陵尉，透露了他的不足之处。这种实事求是的原则，使传主的形象更具有立体感，也给后人以更多的教益和启迪。

4. 谨慎地处理异说——疑以传疑

当时“天下遗闻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司马迁在搜集材料时，遇着一件事或一个问题有几种不同的传说或记载，他是怎么处理的呢？司马迁是十分审慎地采取“疑以传疑”的原则，将不同说法，同时保存下来，留待后人论定。这仍然是一种不专己、不武断、实事求是的态度。

《史记》兼存异说，一般采用这样两种形式：一种，是把不同的说法排比在一篇之中。如《老庄申韩列传》：“盖老子百有六十馀岁，或言二百馀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张守节在《史记正义》说：“‘盖’、‘或’，皆疑辞也。世不得知，故言‘盖’及‘或’也。”异说排在一起，又有“盖”及“或”等字眼的提醒，所以这一种还是容易理解的。另一种，是把不同的说法分载各篇。例如：照《殷本纪》的说法，是比干死而后箕子奴；照《宋世家》的说法，是箕子奴而后比干死；二者好像完全不合。然而本纪所载，和《韩诗外传》相同；世家所载，又和《论语·微子》篇相合。可知司马迁还是各有根据，因无法统一起来，只好两存其说，分载二篇。

其实，关于《史记》的这一条通例，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就已作了揭示：“太史公闻疑传疑，闻信传信。事难的据，欲使两存，故表、传各异也。”

5. 文中插入自注——方便读者理解

司马迁心中有读者，为了读者理解的方便，他在行文时，有时会插入注释加以说明。杨树达在《古书疑义举例续补》卷一有“文中自注例”，说：“古人行文，中有自注。不善读书者，疑其文气不贯，而实非也。”例如《史记·项羽本纪》：“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又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丞相言：‘灌夫家在颍川，横甚，民苦之。请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请？’灌夫亦持丞相阴事（为奸利，受淮南王金，与语言）。宾客居间，遂止。俱解。”

6. 统一文字风格——“成一家之言”

《汉书·司马迁传》谓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大汉”，终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许多来自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的材料经司马迁剪裁熔铸以后，居然变成整齐划一，成为用汉代语言文字写成的新书。里面的内容尽管是陈旧的事实，但司马迁却在一大堆旧材料的基础上作了很细致的加工，删繁就简，补阙订讹，彻底改写一遍，而不是死板地抄袭前人旧书。

《史记》熔铸旧材料，使多种不同的文字记录，改造为统一的崭新的笔调；特别是当编述远古史实时，对古奥艰深的旧文做好了翻译工作，把原是难于理解的古史料，一一变为汉代通行的语言文字，使人人能看懂，而且一气呵成，如行云流水，气势飞动，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如把《尚书》的“庶绩咸熙”，写作“众功皆兴”；《尚书》的“载采采”，写作“始事事”。使人看了就知道是西汉时司马迁的作品，而不再是古代的作品了。张舜徽先生说这便是司马迁自己所说“成一家之言”的实质！^①

7. 记“小事”安插“文眼”——追求隽永

清代文艺理论家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说：“揭全文之指，或在篇首，或在篇中，或在篇末。在篇首则后必顾之，在篇末则前必注之，在篇中则前注之，后顾之。顾注，抑所谓文眼者也。”注，伏笔；顾，照应；都有呼应之意。“眼”点设得好，会更有效地突出主题，使文章含蓄隽永，读来犹如品尝香茗，令人回味无穷。《史记》往往记小事以安插“文眼”。小事与大事联系，小事为大事铺垫（张目）。如《淮阴侯列传》中，第一大段写韩信胯下受辱，有这样几句：

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于是信孰视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

第二大段写韩信破赵之战前，成安君不听广武君策而说了这样的话：

则诸侯谓吾怯，而轻来伐我。

第三大段写韩信杀龙且之战前，又有这样两句：

龙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

第五大段写韩信自己揭开当年宁可胯下受辱的谜底：

故忍而就于此。

^① 张舜徽. 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202.

“怯”→“忍”这一注一顾，是布置得何等精妙！

而在第四大段中，司马迁又曾这样写韩信拒蒯：

韩信犹豫，不忍倍汉。

一“忍”一“不忍”，两相对比，又把韩信的性格表现得多么鲜明！令人读此篇，感慨有余味。

8. 记言富于个性，行为描写高明

记言和行为描写，乃是历史学家刻画人物时最为重要的两大手法。《史记》的记言极富个性，行为描写简洁而高明。以下略举数例（记言，标浪线；行为描写，标双线）：

《史记·项羽本纪》：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

《史记·高祖本纪》：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大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史记·张丞相列传》：昌为人强力，敢直言，自萧、曹等皆卑下之。昌尝燕时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还走。高帝逐得，骑周昌项，问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纣之主也。”于是上笑之，然尤惮周昌。及帝欲废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为太子，大臣故争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上欣然而笑。既罢，吕后侧耳于东厢听，见周昌，为跪谢曰：“微君，太子几废。”

《史记·淮阴侯列传》：信知汉王畏恶其能，常称病不朝从。信由此日夜怨望，居常怏怏，羞与绛、灌等列。信尝过樊将军哙，哙跪拜送迎，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信出门，笑曰：“生乃与哙等为伍！”上常从容与信言诸将能否，各有差。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我擒？”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擒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骠骑将军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任。天子尝欲教之孙吴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天子为治第，令骠骑视之，对曰：“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由此上益重爱之。